

199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
规划·基金资助项目

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与财政对策研究

(总报告)

课题组负责人: 李德章 教授

《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与财政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内 容 提 要

中部跨九个省（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具有农业发达、工业基础较好、交通便利等许多优势。然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差距呈日益扩大趋势。这是观念、体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为此，要按照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重新从理论上理清思路，把握全局，制订新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确定战略目标、选择战略重点、实行多种战略模式，实现经济发展后来居上。实践表明，振兴中部地区经济和振兴中部地区财政具有同步性。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对策，提出了包括树立区域性理财思想、开发区域性财源、建立区域性发展银行，加大区域性财税改革联合试点，加强区域性社会财力调控、统筹区域内人力资本运用及设立中部区域经济协调委员会等建议，目的是使中部地区财政经济在多种联合和合作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与财政对策研究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由来已久，这是历史形成的基本国情特征之一。如何从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推动联合，缩小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再创辉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跨世纪的宏伟任务。现仅就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与财政对策研究，综合报告如下：

一、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与理论依据

（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优势

根据“梯级推移”理论和国家制定“七五”发展规划的建议，曾将我国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其中，黑、吉、内蒙、鄂、豫、皖、晋、湘、赣等九省区属中部地区。土地面积 29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29.8%；1995 年年底人口 4.29 亿人，占全国的 34.9%。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 5 年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持续快速增长和相对平稳运行的态势。它以较发达的农业，廉价的能源、原材料和较方便的交通运输，为我国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和西部地区的启动，发挥了巨大的战略支撑作用。

1、经济运行状况较好，承东启西的地位有所提高。1995年，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5867.6亿元，比上年增加3452亿元。其中，GDP超过2000亿元的有河南（3002.7亿元）、湖北（2391.4亿元）、湖南（2195.7亿元）、黑龙江（2014.5亿元）和安徽（2003.6亿元）。江西、安徽GDP增幅分别高达14.5%和14.3%，位居全国前列。“八五”期间，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吉林等省（区）的GDP年均增长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安徽提前6年实现经济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内蒙古、吉林等省（区）提前5年实现这一目标。

2、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综合实力有所增强。三次产业结构，各省区呈现第一产业所占的份额普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普遍上升的特点。1995年，东、中、西部地区在GDP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16%、25%、26%；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0%、46%、42%；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4%、29%、32%。同“七五”相比，有17个省区第一产业比重降低了5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有12个是在中西部省区；有23个省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6个百分点以上，其中有15个是中西部省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区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3、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度加快。1995年，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120.6亿元，比上年增长20.7%，高于东部地区3.2个百分点。其中，国有经济投资增长为19.2%，高于东部地区的15.4个百分点。近几

年，国家加大了对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1994年和1995年，国家列入重点的建设项目两年合计为290项，中部地区为103项，占全国的35.5%。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已截流成功，建设进展顺利；京九铁路建成运营；黄淮海平原的农业综合开发和治理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湖南五强溪水电站、湖北黄麦岭磷化项目、长春一汽轿车等项目建成投产，为中部地区和全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

4、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明显增强。1995年，中部地区可耕地面积为74336万亩，占全国的37%，人均耕地1.9亩，高于全国人均水平0.14亩。实现农业总产值6785.4亿元，比上年增长9.9%，其中，河南是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最高的省份，高于全国平均值18.5个百分点。粮食产量为19327万吨，占全国的41.4%；人均粮食450公斤，高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4个百分点。棉花产量为209.1万吨，占全国的43.9%；皖、湘、豫、晋等8个中西部传统种棉省区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的85.1%。油料产量、甜菜产量，林产品中的油桐籽、油菜籽的产量均占全国的50%以上。畜产品中的牛羊肉、奶粉、绵羊毛和水产品中的淡水产品产量均占全国的40%以上。五大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高新技术开发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南、吉林、黑龙江等省。1996年通过开发与运作，提高了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共增产粮食25.3亿公斤，棉花93.3万担，增收39亿元。其中，河南的小麦增产4.8亿公斤，增收7.2亿元。这对

确保我国粮食生产上新台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大力发展基础工业，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基地的地位突出。1995年，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为26%，高于东部地区8个百分点。工业地区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中部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为21884.4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23.8%，比上年上升1.2个百分点。其中，在能源方面：生产原煤7.7亿吨，占全国的56.6%；生产原油6631.21万吨，占全国的44.2%；发电量3284.37亿千瓦时，占全国的32.6%。在沿海12个省、市、区年净调入的统配煤中，有96%来自中部地区。在主要原材料方面：钢产量2860.7万吨，占全国的30%；木材产量3747.9万立方米，占全国的62%；铜产量占全国的40%；磷矿产量占全国的45%。全部原材料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0%，高于全国水平，每年净调出的钢材、水泥、平板玻璃，分别占当年产量的30%、66%、80%。为全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6、交通运输业加快发展，成为联系东南西北的桥梁和枢纽。1995年，中部地区运用各种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为186325万人，比上年增长9.92%；完成货运量为140002万吨，比上年增长3.63%；完成旅客周转量为1465.7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2.78%；完成货物周转量为3563.1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8.93%。其中，在铁路方面：中部地区铁路营业线路里程为25387公里，占全国的46.4%；铁路货运量为80082万吨，占全国的50.2%；铁路客运量为42125万人，占全国的41%。在内河航运方面：中部地区内河航道里

程为 36582 公里，占全国的 33.2%；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水运货物周转量为 756.62 亿吨公里，水运客运周转量为 193.07 亿人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2310.20 万吨，在我国内河水运中居重要地位。在公路运输方面：中部地区公路线路里程为 386188 公里。公路线路密度 30.132 公里/平方公里，高于全国水平的 0.02 公里/平方公里；一级公路 242634 公里，占 70%，高于全国水平；河南省“八五”期间，用于公路建设的世行贷款达 4.5 亿美元，郑州交通枢纽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此外邮电通信、信息网络等方面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二）经济发展的差距与原因

1、经济发展差距扩大。1978 年-1995 年，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59 倍，年均递增 17.2%，比全国和东部地区发展速度分别低 0.6 个百分点和 1.9 个百分点。其中，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中份额也发生了变化。东部地区 GDP 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50.3% 上升到 1995 年的 57.7%，提高了 7.4 个百分点；而同期中部地区的比重则由 30.8% 下降为 27.2%，下降了 3.6 个百分点；中部与东部的差距由 19.5 个百分点扩大到 30.1 个百分点，17 年间扩大了 10.6 个百分点。同时，人均 GDP 绝对额的差距也很突出，中部地区与全国的差额由 1978 年的 65 元扩大到 1995 年的 1201 元，由 1.2 倍扩大到 1.3 倍；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额由 1978 年的 172 元扩大到 1995 年的 3307 元，由 1.55 倍扩大到 1.93 倍。

2、产业结构层次低，效益不佳。其中，在产业失衡方

面：1995年，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本区域GDP的29%，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3.9%和2.3%；第二产业占本区域GDP的46%，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5%和2%；第一产业占本区域GDP的25%，则分别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9%和5%，由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失衡影响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在乡镇企业方面：1995年，中部地区按农业人口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东部地区低64.7%；乡镇企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比东部地区低20.9%；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拥有量，东部是中部的3.03倍；产值销售率，东部比中部高出1.53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产值，东部比中部高出110.5亿元；组建企业集团，东部是中部的5倍；投产开业的“三资”企业，东部是中部的16.5倍。在工业企业方面：1995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为30.9%，同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为4.5%和2.8%；每万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为8.55元，同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为0.44元和2.68元；产值利税率为10.2%，同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为1.8%和1.1%；资金利税率为11.7%，同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为0.7%和3.4%；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为1.5次，同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为0.17次和0.08次。

3、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利用外资水平偏低。在投资比重上：东部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1978年的45.2%，提高到1995年的63.9%，17年提高了18.7个百分点。同期，中部地区由1978年的33.3%，下降到1995年的

21.7%，下降 11.6 个百分点。在投资结构上：1994 年中部地区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为 1142.5 亿元，分别占投资总额的 45.9% 和 7.9%，低于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 6.2 %、0.2% 和 3.7%、0.3%。在利用外资上：1996 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达 365.4 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为 88.1%；同一时期中部地区为 39.2 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只有 9.5%，相当于东部地区的 1/ 9。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显示，截止 1995 年底累计的外商工业企业，东部地区占 90.4% 的份额。外商投资新签协议中，东部地区的项目规模为 330 万美元；中部地区为 185 万美元，仅达到东部地区近 1/ 2 的水平。

4、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呈“马太效应”。东部发展水平高的省区和中西部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省区逐年增多。全国发展水平高（人均 GDP 高于全国平均值 150%）的省区由 1978 年的 5 个增加到 1995 年的 7 个；发展水平低（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值 75%）的省区由 8 个增加到 13 个，出现富的发展越来越快，穷的发展越来越慢。在 GDP 增长态势方面：1978 年东部是中部的 1.65 倍率，到 1995 年扩大到 2.01 倍率。人均 GDP 的呈波动扩大之势。1978 年至 1995 年，人均 GDP 位次上升的 8 个省区有 7 个分布在东部地区，人均 GDP 位次下降 9 个省区中有 4 个分布中部地区，人均 GDP 最高与最低省之间的相对差距由缩小继而转为迅速扩大，而绝对额则持续扩大。1978 年至 1991 年，人均 GDP 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之间的相对差额由 3.58 倍缩小到 3.16 倍，1991 年至 1995 年则由 3.16 倍扩大到 4.42 倍。人均 GDP 的绝对额差

距，由 1978 年的 503 元扩大到 1995 年的 6198 元。东部比中部的人均 GDP 倍率，由 1978 年的 1.55，回升到 1980 年的 1.53，1995 年又反弹到 1.92。

5、扶贫与奔小康艰巨。1995 年中部地区还有 182 个贫困县（市），占全国的 30.6%，高于东部地区的 12.8%。全国贫困人口 6000 万人中，中西部地区占 90%。其中，河南省贫困人口为 560 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 7.2%，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8.6%，在中部省份中比例是比较高的。在这些贫困人口中，人均纯收入 300 元以下的特困人口为 107 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 19.8%。在实施本世纪末奔小康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中，全国已实现的小康县（市），东部占 80%，中西部仅占 20%。此外，河南实现小康村为 8022 个，只占全省的 16.7%。因此，加快扶贫与小康建设步伐，在中部地区和中原大省任务相当艰巨。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差距扩大，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观念与体制因素。中部地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商品经济起步迟、发展慢，再加上计划经济的影响深厚，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思想观念的更新，就显得困难重重。而东部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很容易接受市场经济的观念，起步早、发展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已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面军。中部地区至今仍保持着国有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由于国有经济承担了必要的改革成本，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其自身的发展就受到了原有体制的影响，特别是在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之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越来越困难。主要依靠国有企业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自然缓慢。在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中部地区的资源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如价格体制的改革，是先放开消费资料市场，后放开生产资料市场；先放开最终产品价格，后放开基础产品价格。至今油、煤、电、运等基础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由政府控制，仍存在着价格扭曲的情况。老体制既妨碍了资金向中部地区基础部门的投入，又助长了东部地区一般加工工业的盲目扩张，这对资源丰富的中部地区是不利的。

第二，二元经济结构与“剪刀差”因素。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到“三线”建设时期，中部地区在国家财政投资为主动力的推动下，较快地建成以重工业、军工为重点的工业企业和若干铁路、公路干线，形成了一批现代工业比较密集，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并逐步成为辐射周边经济的重要载体和新的生产基地。与此同时，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和地方小企业并存形成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导致一些地区存在着双轨经济运行机制，降低了生产要素的运用效率，抑制了区域增长极扩散效应和连锁效应，影响了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这种结构是加大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基础。据统计，1952年至1990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税收和储蓄三种形式，从农业中净吸收资金约1万亿元，占国民收入全部积累额的22.4%，平均

每年多达 250 亿元，平均农业劳动力每年无偿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最多时达 266 元，相当于当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8.9%。到 1993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系数由 1978 年的 2.4 扩大到 2.5，“剪刀差”的扩大，导致农民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和可支配生产性支出连续明显下降，进而影响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地区与以工业为主的东部地区的差距。

第三，地环多维与多变因素。一是自然灾害频率高。地处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每年承受汛期洪水压力很大，发生较大灾害年份约占 1/3。北方省区的干旱、大风、沙暴、寒潮等气候灾害也比较频繁。据 1995 年统计，中部地区水灾面积达 6416 万亩，占全国受灾的 50.3%；旱灾面积达 12059 万亩，占全国受灾面积的 51.4%，除各省区承受重大损失和沉重负担外，国家每年拨出巨款用于救济受灾区人民解决生产与生活问题。仅 1995 年国家用于自然灾害救济费达 27.27 亿元。二是资源开发与环境污染十分突出。一方面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如农业方面对草坡、山丘、水面的开发利用不够，还有几亿亩的适农适林荒地尚待开发；许多矿产资源也尚未开发利用，特别对一些共生、伴生矿综合利用程度较低。另一方面，资源开发利用过度或者不合理，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如黑龙江省地方林业系统仅 1995 年被乱砍滥伐的林木蓄积量就达 100 多万立方米，占全国超限额采伐林木增加量的 38.6%。内蒙古草原超载放牧引起草原退化、沙化；还有南方山林破坏严

重，造成水土流失。中部地区由于环保意识差，造成污染环境事故相当突出，据 1995 年统计，造成水污染事故 377 次，大气污染事故 338 次，团体废物污染事故 30 次。例如河南废气排放量居全国第 3 位，万元产值废气排放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 倍。全省煤矸石堆放量达 816 万吨，占工业固体废弃物的 39%，占压大量农田，破坏景观。粉煤灰量为 477 万吨，占工业固体废弃物的 23%。这些煤灰，淤塞了河渠，风吹污染大气，影响环境卫生。此外河南省水污染也很严重。废水排放量居全国第 8 位，万元产值废水排放量比全国多 1/5。三是教育落后，人口素质偏低。1995 年中部地区用于文教卫生事业费为 3537 亿万元，占全国的 27.7%，低于东部地区的 24.5 个百分点；用于科学事业费 99 亿万元，占全国的 22.3%，低于东部地区的 34.9 个百分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中部地区为 1.32%，低于东部地区的 0.53 个百分点；其中，河南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 33 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5.5 个百分点，居全国之末位；文盲、半文盲的人口比重是全国最高的 5 个省份之一。

第四，历史与现实因素。差距总是历史的存在，非一日两日间突然形成的。我国地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始终存在。广大的中部地区，隋唐以前曾经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封建时期的基本经济区。但从隋唐起，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了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赶上并超过内陆地区，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海上贸易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最早在长江下游

及东南沿海地区萌芽。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的殖民侵略，首先是从东南沿海城市开始的。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下，中国的近代工业，也就最早在沿海少数的几个城市发生、发展。民国以来，这种产业经济布局更是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内陆地区的传统农业与东南沿海地区先进工业并存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宏伟的开发内陆地区的战略和实行向内陆地区倾斜政策，我国工业经济布局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地区差距并没有缩小，而且有所扩大，其原因是中部地区起点低，基础差，开发与发展的难度大，不容易见效。按我国生产力布局 and 区域分工，加工主导型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资源开发型产业大部分在中部地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础产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致使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部分效益外流。此外，东部地区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华裔和侨民较多，对外引资最初就是从回国探亲的华侨和华裔开始的。而东部地区利用地缘和国家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在改革开放中得到超前领先一步的发展，是形成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原因所在。

除了上述因素外，不同地区和城乡人口增长比例的不同，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的政策不完善，制度不健全、不透明，行政特权的大量存在及缺乏约束力等，也是造成地区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三）加快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加快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

帜，以党的十五精神和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所提出的理论为依据，勾划出区域新的蓝图，重新认识其发展与改革的走向、道路及使命，解决好前进中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确保区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

1、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正确把握改革、发展同稳定之间的关系，把集中力量发展中部地区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论述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打破了以前长期盛行的阻碍我们前进的思想和理论的禁锢。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全局工作的中心地位，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这个中心。要按照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中部地区的经济振兴，才能支撑全国经济的发展。抓住这个中心，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彻底克服内陆意识和摆脱姓“资”姓“社”的干扰。通过改革，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的矛盾，消除各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羁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抓住这个中心，必须正确把握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保证。因此，在中部地区只有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摆在头等地位，努力建设强大的中部地区经济，不断增强经济实

力，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全国的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2、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把中部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推向新的历史阶段。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并从九个方面描述（它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历史阶段；是逐步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逐步转变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建立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历史阶段；是努力建设两个文明的历史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从而告诫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发展是否顺利，关键在于能不能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包括有政治的坚强保证和文化的有力支持。一方面为中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针对中部地区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提出了既要克服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要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必须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部地区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把握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要把改革作为推进中部地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根据思想守旧，改制缓慢，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实际，要增强改革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要加快转制改革的力度，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中部地区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中部地区的薄弱环节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认真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利于全面推进中部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支撑全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3、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确把握市场机制同宏观调控的关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向一个新阶段。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功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纲领的关键，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为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必须紧紧围绕党的经济纲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与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两者是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中部地区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必须提